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

王宝平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

王宝平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王宝平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325 - 6757 - 7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汉语—文学史—研究—
东亚 IV. ①I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553 号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

王宝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380,000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5325 - 6757 - 7

I · 2655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东亚汉文学综合研究

日本汉文学与文化翻译——以论《源氏物语》诗为中心	王晓平	003
“汉籍比较文献学”刍议	孙 文	019
论日本中世禅林汉文学的成因	任 萍	026
南宋禅文学的历史意义	黄启江	037
越南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不可或缺——以《越南汉 籍文献述论》的简介为例	陈益原	073
日本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诗	高文汉	086
浅论日本汉诗的民族性	高 超	094
试论明治时期日人的汉文学意识	杜轶文	105

第二编 东亚汉文学个案研究

《日本书纪》之谜是否解开?	井上亘	123
古代日本文人的汉文学研究方法——以藤原敦光 《三教勘注抄》为例	河野贵美子	141
大坂怀德堂儒者中井竹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论 其宗庙礼制论	田世民	167

柿村重松事迹及其日本汉文学研究	町泉寿郎	187
《本邦支那学的发展》及其意义——从汉文学到中国		
文学	佐藤进	222
韩国檀君神话中的三个天符印	张哲俊	242
略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	孙卫国	260
《韩国诗话丛编》诗话作者及成书时间补正	赵季刘畅	281

第三编 东亚汉文学交流研究

作为古代东亚国际交流手段的汉诗唱和——以菅原		
道真为例	高兵兵	289
关于渤海国和日本的汉诗酬唱交流	李美子	301
朝鲜与琉球文学交流之一隅——以汉诗交流为中心	张源哲	323
宋元时期中日禅林诗文交流初探——以对墨迹史料的		
考察为中心	江静	341
清末中日实业界的汉诗文交流——以永井禾原的		
《观光私记》为主	张明杰	353
近百年来中国人编日本汉诗集述略	王宝平	367
略论晚清王治本的日本游记散文	张如安	382

第四编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

试析日本汉文小说整理研究之进路与成绩——以非		
宗教性作品为范围	王国良	395
日本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近况	王三庆	405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理路刍议	孙虎堂	421

近代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以石崎又造为例·····	川边雄大	431
《警世通言》《英草子》中《庄生鼓盆》故事的传承与发展		
——由通俗性向现实性创作手法的转化		
·····	崔香兰 张红艳	448
朝鲜汉文小说《兴武王演义》版本考述·····	赵维国	465
后记·····	王宝平	478

第一编

东亚汉文学综合研究

日本汉文学与文化翻译

——以论《源氏物语》诗为中心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晓平

日本汉文学正不断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汉诗文出版也日渐增多,这是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件可喜的事情。《域外汉籍珍本丛刊》已出版两辑,数超百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汉文丛书》除了收入《本朝见在书目录》等目录学著述之外,更收入了伊藤仁斋、荻生徂徕、良宽道人、赖山阳、神田香岩、竹添井井、森槐南等从古代至近代日本学人的汉诗文,这对于亚洲汉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陈福康撰写的三卷本的《日本汉文学史》出版,更是标志着中国学界对日本汉文学研究已进入“深水区”。

由于这些汉文著述是用汉文撰写的,不懂外语的学者也可以基本读懂,这使它们的价值超越了语言和国境,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在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得新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真正认识它们的文化意义,也还需要从它们本来的写作和被阅读的“原生态”去加以探讨。认清汉文学的双重属性和翻译性,才可能对它有全面的理解。

既然汉文学是域外作者用非母语的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那么从文化传递和文化移植的角度看,它们不仅在效果上与翻译异曲同工,而且其过程也必然有翻译的介入。由此,对域外汉文学进行翻译研究的尝试,也就不无可能性。说明域外汉文学翻译性的

好材料,就是其中那些描写本国风物的作品。这里仅以日本作者创作的论《源氏物语》诗为例来看一看其中的汉文化和本土文化交织的情况。它们是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的连锁反应,是日本在接受了中国文学熏染后激发的模仿效应,也是两国文化交流深度的直接证明,是汉文学的“中国文学性格”与“日本文学性格”合流的典型材料。

一、日本汉文学的双重性格和翻译的介入

关于日本文学的双重性格,神田喜一郎在《日本汉文学》一文中有一段简明的论述:

日本汉文学本质上无疑属于日本文学,因为它的作者是日本人,其装进内容里面的当然是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日本汉文学”还是从中国文学这样浩大的流水中分出来的一股支流。日本人从中国文学一传进来就把她当做先进文学给以崇敬,追逐她的新倾向,致力于模仿拟作,“日本汉文学”正是在这种情况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日本汉文学”不单是日本人采用中国文字、遵照中国语法创作出来的单纯性质的东西。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可以认为两者之间事实上从文学上、历史上都不能截然划出一条“国境线”。在某一点上,不如认为是从属于中国文学,也是妥当的。而且这样也才能够理解它。总之,在“日本汉文学”里,有着这样一个双重性格。正是这种双重性格,也无疑是“日本汉文学”与生俱来持有的宿命性的显著特质。^①

① 神田喜一郎著:《墨林閒話》,岩波书店,1977年,第129页。

神田喜一郎的议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之所以强调日本汉文学的双重性格,正是因为在日本国文学领域,曾经有一种将汉文学边缘化,甚至试图将其驱除出境的倾向,原因是说它是外来文学,甚至是“殖民文学”,而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因为它是正宗的中国文学而加以轻视。“日本汉文学”的双重性格,招致了近代以来伴随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学科细分带来的双重冷漠。这种现象,延续了若干年,至今并未完全消除。

神田喜一郎的上述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汉文学发生发展的关系。没有中国文学的种子,就没有日本汉文学的枝繁叶茂;而如果没有汉文学的诞生和壮大,中国文学传播的规模 and 效果便会大为缩水,绝对形成不了今天看到的丰厚历史积淀。汗牛充栋的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传播最显赫的见证和标志。汉文学作者,就是中国文学最热忱的接受者和创作实践者。

这里所说的亚汉文学,不是指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而是指当时中国以外的民族的作者用不同于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民族语言写作和阅读的,作者是非母语写作者,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双语操作。它们是外国人创作的“华文文学”,理所应当纳入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这种写作和阅读过程都伴随着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这种翻译如同训读一样,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而且是一种文化移植、文化融合的过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两种文化兼容的产物,不是单纯的汉语文化,而是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可以说,亚洲汉文学的双重文化性格,规定了它与翻译研究的联系。

亚汉文学和欧洲各国的拉丁语文学不同之处,正在于这里的作者日常并不一定是操汉语的,而是通过掌握训读这种独创的汉文阅读方法,从无数次的阅读体验中熟悉了汉文的写作规律,开始运用汉文这种书面语从事写作的。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双母语者或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人之外,多数作者并不会说汉语,汉语不是

他们直接思维的工具,汉诗文写作是在头脑中经过翻译过程才得以实现的。经过多年的积累和训练,他们可以写出和汉族作者相差无几的作品,这些作品甚至足以抹掉翻译的痕迹,让人误认为作者也和中国作者一样只是在那里用汉语抒情表意。从形态上说,它们属于中国文学。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表现的仍是日本的文化风土和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因而从内涵上说,又属于日本文学,是不熟知日本文化便无法深刻理解的。这种形态和内涵上的矛盾,常常为文字的表面所遮蔽,也容易被两国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轻易忽略。

在日本方面,训读和写作的训练,甚至也会产生一种误解,那就是好诗好文,只要经过训练,谁都可以做出来,而在中国方面,似乎读懂了文字,就领略了深意。我们揭示汉诗文写作的翻译本质,就可能更切实地理解汉文学在国际交流中的真实意义。充分认识汉文学的双重性格,就是既看到它的“中国文学性格”,又看到它的“日本文学性格”,这两种性格不是截然分离、各自对立的,而是以中国文学的面貌和形式,承载着日本人的情感精神,奇妙地融汇混杂在了一起。

从“中国文学性格”来讲,汉文学的发生就是中国文学传播和影响的果实。然而,尽管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史之悠久和规模之宏大罕有类例,但这种传播绝不是现代建筑整体平移式的照搬,也不是“集装箱式”或囊括卷包式的照单收取,由于文化交流的不完全、不平衡、不对等规律,中国文学被“散装邮寄”,并经过历代学者的随性以取、应需而变,因而,流传并影响于日本文学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强的日本特色。汉文学同文异读的特点,如果去掉了表明读法的种种训点标记,在外观上有时与中国诗文无异,这时其“日本文学性格”就变为“隐性”特征了。日本的情况与这有些不同:对于谙熟训读的日本学人来说,看到它就能以日语读出,其“中国文学性格”也似乎隐而不显,当然,对于今天一些没有训

读知识的日本人来说,它们也可能被看做纯粹的外国文学。

亚汉文学与中国人的作品根本的不同是一种同文两读的文学,即日本汉文学日本人用日语去读,中国人用汉语去读,韩国汉文学韩国人用韩语去读,中国人仍然是用汉文去读。也就是金文京所说的“同文异读”。在中国人这里,汉语读写是统一的,而在日本人那里读写存在尖锐的矛盾。不仅汉字读音多歧,而且写出来的语序和诵读的语序乖离。江户时代学者伊藤东涯在他的《训蒙用字格》中说“汉土言语与日本言语,其次第不同”,他举例说,汉语中“修身”和“身修”、“知人”和“人知”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以日语读汉土文字,须上下反复理解其义,非如汉人之直读,因是写文章,文字之置多有谬误,解读时错误领会义理。当写“修身”处,写成“身修”,当写“知人”处,写成“人知”。这些实际上都是日本人在写作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母语干扰。日本人在阅读汉文的时候,要颠倒来读,即改变原文的语法读作日语文章;而在写作的时候正好相反,先按照日语语序去思维,而在成文时要写成汉语语序,前者可以用训读符号做到目光上下移动自然读出,后者则需要长期训练,才能习惯,做到前后过程的统一无误。文字和语言的矛盾在写作过程中就是靠翻译去克服的。

二、《赋光源氏物语诗》:外字、外句与外习

获生徂徕《萱园随笔》谈到日本的“和习”问题。所谓“和习”,就是日本人作汉文时,受日语影响而出现的独特的癖好、用法。他把以和训而误解字义的,称为“和字”,把“语理错综,位置上下失则者”称为“和句”,把既非“和字”,又非“和句”,而“语气声势与中华不纯者”称为“和习”。日本人用并非本民族的语言——汉语,写作本来属于外国文学的汉诗文,受到本国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事。

获生徂徕这里所说的“和字”，比一般所说的“和字”、“倭字”、“国字”意义更为宽泛，是指日本特有而不同于中国的字义，而一般所说的“和字”（倭字、国字），连字的本身也是唯日本所有而中国不曾存在的，那就更是获生徂徕的诗文观所排斥的了，然而却存在于日本汉诗文中。从日本汉诗文来说，有和字、和句和和习。类似的是，朝鲜半岛的汉诗文，也会有韩字、韩词和韩习。韩字，也就是古代朝鲜为了表示自己特有的人名、地名、特有事物名而仿照汉字造字规律自制的字，在那里被称为“固有汉字”。类似的情况，在越南也存在。

那么，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不妨给这些中国以外民族创造的汉字一个统一名称，叫它们为“外字”，以与中国本土汉字相对照。同样，把中国不存在而这些国家自创的词语，称为“外句”，“外句”里面，还包括他们在汉诗文中创造使用的本国典故，也可以称为“外典”。除此之外，那些不同于中国的情调，也不妨称为“外习”。这样，描述起相关的现象，就方便一些了。

神田喜一郎曾写过一篇《和习谈义》^①，谈到日本人为了写出纯粹的汉语诗文，是怎样不断努力清洗“和习”的。江户时代儒者清田儋叟在他的《艺苑谈》中曾经主张不说“倭习”，而说“俗习”，因为汉语中也有通俗语言。他主张“辨主客，去俗习，减轻薄”，认为“不去俗习，则无真文章，若给唐土人观，则当相传取笑”。^② 儒者坚持汉文学理应用纯粹的汉语去写，而不应该掺杂日语的表达方式，这种努力对于提高汉诗文的水准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很可能江户时代的汉诗文还停留在奈良时代的水准上。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作者的艰苦磨砺，才会有平安、江户两大汉诗文的高峰。

然而，当日本学者用汉诗文来描写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

① 神田喜一郎著：《墨林閒話》，岩波书店，1977年，第99—115页。

② 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詩話叢書》第九卷，龙吟社，1997年，第2—4页。

感的时候,他们写作中的翻译就会遇到极大的困惑,那些中国没有的事物和情绪该如何表述?是保留原有样态和情味,还是将其彻底转化为汉文化模式?这样的问题和翻译过程中的“异化”、“同化”就不无共同点了,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何况有些事物和情感,是很难用汉语一一对应的,也就是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层次几乎“不可译”。不论是有意存异,还是无奈存异,汉诗文中都可能出现些“异物”——即我们所说的“外字”、“外句”和“外习”。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外字”、“外词”和“外习”都是翻译的痕迹,是在将本国作品译成外语时产生的新字、新词、新习。具体来说,就是将本国语言转化为外国语言的时候,遇到外语不能表达时不得已使用的本国自造字、自造句和特有意,或者是为了突出本国特征而使用的本国自造字、自造句和特有意。如果从一切遵从译语的原则出发,就会将它们视为译语不纯熟、不彻底的表现,像获生徂徠那样主张予以清除;如果从文化传递的观点出发,则会承认它们中有一部分存在的某些合理性。

平安时代诞生的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无疑是最具“日本文学性格”的作品之一,那以后的汉诗人是怎样看待这样一部在汉唐文学中还未见先例的作品的呢?

《群书类从》第九辑所载《赋光源氏物语诗》,是根据写本整理而成的,文末注明:“右《赋光源氏物语诗》以冈室正定藏本书写,他日亦得一本校合了。”据其短序,当作于正应年间(1288—1293),时当平安时代,作者多处将紫式部与白居易相提并论,是白诗流行时代的产物,为《源氏物语》五十四帖,每帖赋诗一首。这篇由五十四首诗歌构成的组诗的“中国文学性格”,最重要的就表现在作者力图将《源氏物语》纳入汉唐思想文化体系当中,援用中国儒家和佛家的理念和术语,对《源氏物语》的价值加以提升,认为该书中叙述的故事“皆追圣代圣治之法度,莫不可左史右史之书纪”,符合正史的标准,而且具有“论政理”、“述畋游”、“敬灵神”

的思想观念,从中可以领略到“南华之梦”即老庄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佛教的无常思想,突出了“显教密教之奥旨”,依据的是“灵山世尊之法华”,这种批评的基础,正是儒道佛统一融合的思想体系。组诗三十二韵全都用到,遵照的是也是中国韵书的规范。

与“中国文学性格”相比,其“日本文学性格”则显得隐晦,我们不妨先从遣词造句切入。由于组诗是以《源氏物语》为吟咏对象的,每一帖的题名就都保留原文方式,这实际上也就把日语带进了汉诗之中,诗歌出现了和字、和词和和习,即外字、外词和外习。

今天的翻译者面对这些“外字”,也有一个选择问题,不妨将诗中引用的篇名与丰子恺、林文月译本的译名做一个对照:

《赋光源氏物语诗》篇名	丰子恺译	林文月译
	本篇名	本篇名
第十帖,诗题作“榊”(今本作“贤木”)	杨桐	贤木
第十七帖 绘合	赛画	绘合
第二十一帖 未通女(今本作“乙女”)	少女	少女
第二十八帖 野分	朔风	野分
第三十帖 藤袴	兰草	藤袴
第三十一帖 “被木柱”(今本作“真木柱”)	真木柱	真木柱
第三十四帖若菜	新菜	若菜(上)
第三十五帖若菜	新菜续	若菜(下)
第三十九帖御法	法事	御法
第四十二帖匂宫	匂皇子	匂宫
第四十六帖椎本	椎本	柯根
第五十三帖手习	习字	手习

以上所列,有“外字”,如“榊”(さかき)就是一个日本“国字”。谈到诗中的“和字”,如《榊》:“野宫旅馆榊枝有,良夜凌晨感几多。”用到“榊”字。又如《蓬生》:“见花便入蓬蒿径,非相犹寻松柳门。”其中的“相”(すぎ)字,《现代汉语例解辞典》认为是“国字”,是“杉”字的俗体。再如《槿》:“蓬杣夜风吹雪乱,槿篱朝雾锁花深。”其中的“杣”(そま)字,《现代汉语例解辞典》也注为国字,意为砍柴火的山。

更多是“外词”。《赋光源氏物语诗》帖名全部保留日语词,而林文月也尽可能保留了日语词,只有“少女”一词,改用了汉语词,基本属于“异化”处理,尽管她估计读者不一定能理解词语的准确含义,也就让他们在篇名神秘色彩的笼罩下迈进作品,而丰子恺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归化”处理。《赋光源氏物语诗》把日语词原原本本带进汉诗,从日本文学的角度说,是内容的需要并绕开翻译的困难,对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引进了新的词语。

《赋光源氏物语诗》的作者为了凝缩和表达《源氏物语》中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内容,在诗歌语汇上,苦思冥想。第五十帖《东屋》(丰子恺本译作《东亭》),描写薰君二十六岁秋天与东国女子浮舟的相会,题名“东屋”(アヅマヤ,即アズマヤ),是一个双关语,东国,即“吾妻”(アヅマ),既是地名,也有穷乡僻壤之意。薰大将与浮舟有这样的对话:薰大将问浮舟:“你常住吾妻地方,吾妻的琴总会弹吧?”浮舟答道:“我连那大和词也不大懂得,何况大和琴。”^①东国的琴名曰“吾妻琴”,薰大将故意称为“吾妻的琴”,而“大和琴”即“吾妻琴”,“大和词”即“和歌”,浮舟一语双关,回

① [日]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51页。这一段林文月译本将两人的对话分贝译作“既然是在东土生长,所谓‘可怜吾妻’应该知道一些才是”、“人家连‘大和言语’都没有学好,更遑论‘吾妻’琴艺了”。见林文月译本(四),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